



著名的政治改革家

王安石

·王冰泉·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曾被封为荆国公，所以后人也称他为王荆公。他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王安石祖籍系原临川县城（今抚州市）盐埠岭，父亲王益大半生携带家眷在外地任地方官吏。天禧五年（1021）年，王益任临江军（今江西樟树市境内）判官时，王安石于同年的农历十一月十二日辰时出生于县城内的维崧堂。王安石虽一生奔波宦途，但亦曾多次回归临川故乡，其中第一次是在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因祖父王用之病故，十三岁的王安石随同父亲从韶州（今广东韶关市）赶回故乡奔丧，并在灵谷峰上守孝三年；第二次是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二十三岁的王安石考中第四名进士后，任淮南（今江苏扬州市）签书判官不久，借着到江南漕运上公务出差的一个机会，回乡看望祖母和祭扫外祖母坟墓；第三次是在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王安石时年三十岁，从鄞县

（今浙江宁波市）做了三年县官后，任满回汴京等待分配新的职务，趁空返回故乡。由于他一生中在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居住的时间比较长，他的父母和大儿子王雱都葬在江宁，因此他罢相后选择在江宁蒋山的半山园闲居，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王安石从小天资聪颖，博学多才，“自诸子百家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他在随父亲奔走南北的生活经历中，亲身体会了大地主、大官僚对中小地主、下层官吏的压制，目睹了兼并势力造成的“民劳财匮”的社会状况。在历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地方官吏之后，他经过长期的社会观察和调查，对当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社会危机更有深刻认识，怀有“矫世变俗”改革政治的志向，曾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但未被仁宗采纳。宋神宗即位后，王安石被提拔为参知政事，继而两度出任宰相。他在执政期间，积极改革弊政，推行新法。新法的内容有：青苗法（在青黄不接之际政府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限制豪富大户趁机剥削）；免役法（改变“差民充役”旧例，实行“计产定赋”，“募民代役”，减轻徭役的摊派）；方田均税法（重新清查丈量全国田亩，防止豪强地主隐田漏赋）；农田水利法（兴修农田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市易法（政府管理商业，防止大商人垄断市场，渔取暴利）；保甲法（将乡民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维护治安和防御侵略）；将兵法（改善军队的素质，提高作战能力）以及培养和选拔人材的学校制和科举制的改革等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王安石变法”，或称“熙宁变法”。

王安石还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中国历史上

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反对唯心主义理学，创立了“新学”。在他的哲学思想中，肯定事物“有偶有对”，有矛盾对立，因而促使事物发生运动变化。他运用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进化论观点，主张“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提倡不断革新的精神。他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推行变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抑制兼并，抵抗外侮，富国强兵，使当时的国家得以长治久安。尽管王安石制订的新法在取得一些效果后被守旧派罢去，但对后世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所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王安石在我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诗文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对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后人推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反对西昆派对声律对偶的片面追求，主张“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提出“以适用为本”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点。他的前期诗歌有充实的现实生活内容，格调遒劲清新，词虽不多而立意高峻，反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变法斗争。他的散文重视以富有说服力的理论作内容基础，具有用语简炼、朴素、立意超卓的特点。王安石写作态度非常严肃，他的脍炙人口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据说其中的“绿”字是改了十余次方才定下来的，这种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是值得学习的。王安石晚年由于心情十分苦闷，且受佛教影响颇深，诗中虽多闲适遣兴之作，但亦有关心时世、格调高昂之作，在艺术上更臻于炉火纯青的境地。所著《字说》、《钟山日录》多已散失，现仅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中的《周官新义》残卷行世。

在封建士大夫中，王安石的个人品节是难能可贵的。他位尊宰相，却“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质朴俭素，生活简约。他的妻子吴氏曾经瞒着他为他买了一名小妾，王安石发现后，将小妾退还给原来的丈夫，并赠给金钱。王安石生性孝友，所得的俸禄，任凭家人取用。他在为母亲守孝期间，一个送信人来到他家，见他穿着朴素，竟误认他是“院子”（家仆）。他一生为官清廉，反对贪鄙，从不坐人抬的轿子。有一次生病时，部属送给他一些党参，他也断然拒绝。晚年退居江宁时，他住在蒋山半山园的几间简陋的房子里，后来又捐出作寺院；每逢外出，他骑一条小驴子，途中相逢客人，便下驴坐在小凳子上交谈。王安石这种平易近人、生活简朴的作风，使得那些百般诬蔑、攻击他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素有德行”，“平生行止无一流（污点）”。

王安石手迹

素淡特在
 華衛珠闕徒空然
 恩久閱鄉江情多
 矣宿寒
 安石明日僕
 上月領一飯否餘雷
 面叙不宣 素淡

荆公祠，又称荆国王文公祠堂，是祭祀“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的祠堂。祠堂旧址在抚州城内盐埠岭（又名“羊背岭”，俗呼灯草巷，即今邓家巷地区林建公司所在地）。盐埠岭原为王安石祖居所在地，位于城内东南隅的桐林峰之侧，靠近舟车云集的清风门码头，东南面对滔滔奔流的抚河，古来为抚州城内佳秀之地。王安石生前很喜欢这个地方。他在《新修九曜阁记》一文中说：“城之东，以溪为隍，吾庐当其上……观岸溪水，东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安石少时因尝从长者游而乐之”。

王安石生前未建祠堂。因为他一生操守廉洁，“视毁誉如浮云”，即使是当宰相时，也不允许家乡人为他建立生祠。他终老南京后，元祐党人得势，他弟弟王安上的后裔为避免元祐党人的迫害，迁往临川七十九都（今东乡黎圩上池）僻居求安，亦未为王安石建祠。直到王安石逝世三十年的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元祐党人失势，王安石的声望得到恢复，抚州知州田登方才为首集资，将王安石祖先居住的住宅改建为祠堂。王安石退休金陵期间，丹青名手李公麟为他在定林庵昭文斋墙壁上画了一幅“照写精妙，形态逼真”，“著帽束带，神采如生”的肖像。这次建祠时，王氏后裔便把金陵定林庵上的这副画像临摹下来，配上王安石夫人吴氏的画像，一同供奉在祠堂内。定林庵后遭火毁，这幅王安石画像的摹本，便成为一件珍贵的文物资料，解放后已交国家博

荆
公
祠

· 王冰泉
胡一辉 ·

物馆收藏。

荆公祠建成后，时兴时废。宋绍兴初（1131——1141）和隆兴元年（1163）先后加修过一次。四十余年后，祠宇“坠圯已甚，过者咨叹”。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抚州知州钱象祖“慨然而新之，视旧加壮，为之管钥掌于学官，以时祀之”。当时理学大师陆九渊还撰有《荆国王文公祠堂记》。荆公祠经过这次大修，焕然一新，面积也比以前有所扩大，祠旁还建有“崇儒书院”，同时把祠堂的钥匙交给学官掌握，由他们管理祭祀之事。元至顺初（1331）祠堂又倒塌，草庐先生重加修缮。到了明代，祠堂的产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由官府转到王氏后裔手里。从此，就发生了王氏各支派争夺荆公祠的产权之争。据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和《抚州府志》记载：明初叶，东乡上池的王安石弟弟王安上的后裔王孟演，当时身为抚州府学教授，便主管过这祠堂。但到明代中叶天顺成化年间（1457——1465），其孙王宗琏两次以遗祠转典与人（临川璜溪王氏族谱载：变卖与人）。以后居于临川城北（即临川璜溪王氏）的王安石弟弟王安礼的后裔王生瑞，又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请托有权势的人把祠堂夺为已有（临川璜溪王氏族谱载：上诉至官府三审终结，判归为城北王氏主管），以保存荆公祠遗迹。在这长期的争夺中，荆公祠虽也修葺几次，但至清末却完全颓废。1936年又重修过一次，改名“荆国公祠”。

荆公祠原貌，未见文字记载，难以查考。现从《王氏家谱》所载《荆国王文公祠堂图》来看，可知其规模不小，共为二进。前有八柱门楼，上悬“进士”、“尚书”、“文魁”横匾。进门两侧皆有厢房。厢房分别辟有“崇德”、

“尚贤”二门。二进门首共有两层，上层悬有“恩荣”横匾，下层悬有“三公世家”横匾，门首两侧设有“祭器库”、“祭仓储”，二进里面则是祭堂，设施颇多。至于1936年重建的荆公祠，规模甚小，门首半洋半土，内有房间七八间，祭堂只有二三十平方米，祭堂内只悬有一幅王安石画像，别无其他纪念设施，一度为临川县图书馆馆舍。1942年被日机炸毁，仅存门面而已。1963年又被拆毁。现仅存祠堂门头上的刻有“荆国”二字的半截石匾保存在市博物馆内。

荆公祠建成以来，历代过客骚人多来此游览瞻仰，留下了不少诗章。有的对王安石进行贬讽，有的进行赞颂，有的表示慨叹。清初文学家李来泰的《七律》则云：

“十年高卧此峰东， 出处无端衅已丛。
洛蜀党成终误国， 熙丰法敝岂缘公？
争墩已赋三山石， 记里犹传九曜宫。
漫向春风寻旧泽， 史书功过亦蒙蒙。”

在这首诗里，李来泰指出，北宋误国的是洛、蜀党人，而不是王安石。他们对王安石的攻击和诬蔑，是无端挑衅。大胆地为王安石打抱不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此篇是编者根据王冰泉同志的文章和胡一辉同志的来稿综合整理的）

王安石纪念馆，座落在抚州市赣东大道南端西侧，是一座占地二十亩的园林式仿宋建筑群。它自1987年11月11日落成开馆以来，就象一颗璀璨的明珠，吸引着国内外学者和游客。

王安石纪念馆

· 黄汝香 ·

王安石纪念馆整体建筑的布局呈凹字形，主楼靠北，座北朝南；游廊、水榭、踟躅园、辛萸园、接待室和小卖部靠东；碑廊、荷池、荆公亭和怀文堂靠西。“凹字”的空场绿地中央，耸立着三点三米高的玻璃钢质王安石塑像。塑像王安石，头戴平天冠，身着宰相服，头微昂，眉微蹙，鬚髯飘拂；左手扶腰间角带，右手长袖后甩，呈“意行直前，敢当天下事”之神态。

王安石纪念馆的主体建筑是陈列馆。它榻山飞檐，圆柱筒瓦，花格门窗，格调优雅堂皇；飞檐、筒瓦呈灰黑色，台柱、门窗呈楠木色，气氛古朴庄重。陈列馆集古代城楼宫殿之美为一体，分为上下两层。一楼陈列“随宦各地、眷念故里”、“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两大部分；二楼陈列“彪炳史册的文学家”、“磊落大度、廉洁自持”和“人间遗爱、翰墨流芳”三大部分。陈列馆内，有王安石出生地临江，故里抚州城盐埠岭和他曾宦游、居住过的扬州、鄞县、舒州、常州、波阳、开封、南京等地的大型彩照二十余帧，根据龙舒版本影印的《王文公集》、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王临川文集》和各个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王安石全集》、王安石

任官地区的县志、府志和《王氏三修族谱》、《王氏九修族谱》、《甘溪王氏十修族谱》以及王安石手迹《楞严经旨要》影印件也陈列在柜。整个陈列馆以图片、国画、图表、雕塑和实物陈列等形式，从各个不同侧面详实地再现了王安石的改革家的胆魄、文学家的风貌，令观者游人深受启迪。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学家姚公骞参观王安石纪念馆后挥毫撰联曰：“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自古英豪钦卓识；道德可以师，学问可以传，文章可以诵，至今乡里仰遗风。”

王安石纪念馆的附属建筑怀文堂，朱窗白墙，雕栏玉砌，酷似南京王安石故居半山园，且具“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挹送青来”的田园风光。辛荇、踟躅二园内，花团簇簇，绿草茵茵，游人身至其中，极易想起荆公的“踟躅万树红相国”，“携手辛荇树下行”等诗句，平添许多幽情雅趣。

王安石生前尽管长期宦游在外，但很眷念家乡。今天，家乡为他建立了这么好的纪念馆，他在天之灵有知，一定会写出比“回首江南春更好，梦为蝴蝶亦还家”更加充满激情的诗章！

（摄影：朱育文）





伟大的戏剧家

汤显祖

· 史志实 ·

汤显祖，字义仍，别号若士，又号海若，自署清远道人。抚州临川（今抚州市）人。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戏剧家，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

汤显祖出身书香门第，祖上四代均有文名。祖父汤懋昭，性情高洁恬淡，作文挥笔成章，乡里文人推他为“词坛上将”。父亲汤尚贤，知识渊博，为文古奥，品德高尚，乐善好施，但一生不愿出头露面，被乡里称为“可闻不可见”的雅士。

汤显祖身受家庭薰陶，自幼勤奋好学。五岁能属对，十四岁即补县诸生。胞弟儒祖，亦天资颖异，“读书十行并下”，与显祖并称“二龙”。隆庆四年（1570）秋，汤显祖参加乡试，得中举人。主考官对他的文章十分赏识。二十六岁时，即在知县李大晋主持下，刊行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红泉逸草》。于是文名远扬，“海内人以得见汤义仍为幸”。

汤显祖的文章虽然写得很好，被人誉做“时文大家”，然而自中举以后，科场并不得意。万历五年、八年两次参加

会试，均因拒绝宰辅张居正延揽而落第。直到张居正死后第二年（万历十一年，1583），始成进士。但在“馆选”时，又因不受内阁辅臣申时行、张四维罗致，主动拒绝应试，放弃入选良机。万历十二年，汤显祖离京南下，出任南京太常寺博士；万历十六年，改官南京詹事府主簿；翌年，擢升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均属闲官。

汤显祖青少年时代曾受王良哲、罗汝芳进步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影响很深。步入仕途后，又目睹皇帝荒淫，不理朝政；内阁纷争，党同伐异；贪官污吏，祸国殃民，乃怀着满腔义愤，于万历十九年上《论辅臣科臣疏》，历数权臣申时行罪过，揭露官场黑暗，抨击大明弊政，因而触怒了神宗皇帝，被贬谪到广东徐闻任典史小官。

万历二十一年（1593），汤显祖四十四岁时，由徐闻调到浙江遂昌县（即平昌县）任县令。在遂昌任职期间，他首重风化，兴教劝学，扶持农桑，打击豪强，翦除“害马”，灭虎纵囚。遂昌多山，虎患严重，有时老虎竟闯入县城，肆虐伤人。汤显祖莅任不久，即发动了一场群众性打虎运动，并亲领兵民上山打虎，前后共灭虎十七只，从此虎患得以平息。县人大喜，建祠纪念。汤显祖为作《遂昌灭虎祠记》。汤显祖在翦除“害马”时，对盗酋匪首，从严惩治，决不姑息。曾“勒杀盗酋长十数人，县稍以震”。而对一般罪犯，则采取既绳之以法，又喻之以理，复动之以情的政策。他在元宵佳节放囚犯出狱看花灯，又在除夕让囚犯回家过春节。这种宽严结合，恩威并施的做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汤显祖在遂昌为官五载，政宽民和，人寿年丰，成绩卓著，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一时循吏声为两浙冠”。但终因昏君无道，奸臣当朝，国事螭蟾，生灵涂炭，特别是万历二

十四年（1596），皇帝任用一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搞得“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郡，丝粟皆空”，全国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遂昌自亦“在劫难逃”。面对这种情况，汤显祖深感自己既不能与恶势力同流合污，又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于是决心跳出宦海，告别官场。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趁赴京上计之机，愤然辞职还乡，专事戏剧创作。“托诸声曲以寄意”，利用文艺为武器，进行反封建斗争。

为了便于戏剧的创作和演出活动，万历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汤显祖从城东文昌里旧宅迁至城内沙井新居——玉茗堂。在这里，他先后完成了《牡丹亭》（全称《牡丹亭还魂记》）、《南柯梦》（亦称《南柯记》）、《邯郸梦》（又名《邯郸记》）的创作，加上先前创作的《紫钗记》，合称“玉茗堂四梦”，或“临川四梦”。“四梦”之中，以《牡丹亭》最负盛名，是一部盛演不衰，环球称誉的光辉著作。该剧一问世，即轰动了当时文坛，“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作品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笞。一部《牡丹亭》，就是一篇以“情”格“理”的反封建宣言书，堪称我国文坛曲苑的瑰宝，对于当时和后世的戏曲创作，都产生了深刻、重大的影响。

汤显祖不但长于写戏，而且能演会导。他曾在一首诗中言道：“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板教小伶。”

汤显祖在戏剧理论上亦颇有创见。他所写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就是他戏剧表演理论的集中表现，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戏曲理论遗产，为我国导演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文学方面，汤显祖反对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等人

“文必西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写文章要力脱俗套，务去陈言。汤显祖与沈璟为首的格律派也针锋对垒。他反对格律派的“宁协律而词不工”的极端倾向，主张“以意、趣、神、色为主”。汤沈之争，实际上是晚明文学创作中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斗争在曲坛上的一种反映，对戏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汤显祖不仅以文章名世，且品节可风，连外国学者也认为：“汤显祖不仅于戏曲上表现其伟大，即其人格气节亦颇有可羡慕者。”他在遂昌为官多年，始终清风两袖，并为营建当地的学舍和射堂捐献了自己的薪俸。弃官归里后，经济上虽很拮据，却能安贫乐道，一心一意为戏剧创作呕心沥血，朋友多次请他复出为官，他都一一谢绝。有人劝他做些官场应付文字，以增加点家庭收入，他却说：“吾不能以面皮、口舌搏钱刀。”他常指着床上的书对人讲：“有此不贫矣！”他自己家境清寒，却总以助人为乐，对贫困有难的求告者，虽“昏夜叩门而请”，也从不推拒，倘自己无能为力，“必旁宛助之”（转请他人帮忙）。汤显祖还热心于公益事业。他还乡后看到早已圯毁的文昌桥，尚未修复，忧心如焚，旋倡“复桥三不难”之议，且率先解囊，带头捐资。又与驿丞孙耀祖，积极筹划，劳心劳力。万历二十七年，大桥终于修复，郡民交口称便，额手称庆。显祖亦兴奋不已，欣然命笔，撰写了《新成文昌桥记》。

汤显祖虽然弃官归隐，且一度欲佞佛以自慰，但他并无避世出世思想，而是始终心系天下，忧国忧民，常说：“天下忘吾属易，吾属忘天下难。”他教诲门人子弟立身处世“必须不要钱，不怕死”，而应“真正做人，清廉用世”，勉励后辈须“珍重少年人，努力天下事”。他曾作“四香

戒”警策儿孙：“不乱财，手香；不淫色，体香；不诳讼，口香；不嫉害，心香。常奉四香戒，于世得安乐。”

汤显祖虽曾涉猎佛学，结交僧侣，但他并不迷信宗教。他在《答王相如》的信中说：“秀才念佛，是英雄末后偶兴尔！”他在逝世前夕曾作《诀世语七首》，以为遗嘱。内容主要是：一祈免哭（亲属不要号哭），一祈免僧度（不要请和尚念佛超度），一祈免牲（不要用牲畜祭祀），一祈免冥钱（不要烧化纸钱），一祈免奠章（不要撰写、宣读祭文，大表功德），一祈免崖木（不要浪费上好木料做棺材），一祈免露（不要久厝搁延，从速埋掉）。此“七祈免”，不啻是对封建迷信、丧葬旧习的宣战。这在三百多年前的旧时代，何等难能可贵。

万历四十四年六月十六日（1616年7月29日），汤显祖病逝于玉茗堂居所，终年六十七岁。遗体安葬于文昌桥东灵芝山。家乡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戏剧家、文学家，将抚州城内的一条街道命名“若士路”。人民政府还拨巨款在玉茗堂遗址兴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玉茗堂影剧院”，内辟有汤显祖纪念室。对汤氏墓也进行了数次修葺，现陵墓已迁移到风景秀丽的人民公园，供海内外人士凭吊瞻仰。

汤显祖一生笔耕至勤，著作甚富。除剧作“四梦”而外，尚有三千多首诗词歌赋和大量散文。解放后，国家出版社对汤氏著作进行了整理，将戏曲和诗文合为一编，书名《汤显祖集》。汤氏著作，特别是戏剧名作，早已流传海外，且受到高度评价。日本著名的戏曲史家青木正儿把汤显祖和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他说：“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莎氏之逝世一年而卒（据专家考证，汤氏与莎翁是同年而卒），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奇也。”

玉

茗

堂

·周吉中·

“沙井阑头初卜居，穿池散花引红鱼；春风入门好杨柳，夜月出水新芙蓉。”百花、杨柳；春风，夜月；还有那悠然闲游的红鲤鱼，何等美妙的“玉茗春景图”。这是我国明代杰出的戏剧家汤显祖为自己的居所玉茗堂所题的一首小诗。

这时的玉茗堂，面积不小，东起今玉茗堂影剧院后墙，西至今地区印刷厂前办公楼；北起今五一菜市场卤菜门市部，南至今地区轻化局，是汤显祖弃官归家后，用于写作、演戏和宴会宾客的地方。汤氏的戏曲代表作《临川四梦》中的《牡丹亭》、《南柯记》和《邯郸记》皆成于此。堂以人名而名。“起衰八代有文章，海内争推玉茗堂。”汤显祖名垂青史，文留千古，玉茗堂也便成为我国文化史上富有纪念价值的胜地。

玉茗堂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3），万历二十三年（1596）汤显祖在其《紫钗记》第一出《西江月》中称：“标题玉茗新词”便以玉茗为堂名。其堂称玉茗，是因为早年抚州城内有一古树奇花，名曰“玉茗花”（又叫白山茶），宋代大文学家曾巩称：“琼花（在扬州后土庙——编者）与此花天下惟一本，琼花可接，此花独出”，“纯白得天真”；宋抚州知州家坤翁称此花“不与桃李争春风”，“众醉独醒”；而陆游则谓之“格韵高绝”。本来就刚正不阿的汤显祖，建此堂时已厌倦于官场，故取其意将新居名为“玉茗堂”。

汤显祖平素为官清廉，兴建玉茗堂时，家资不丰，故从始建到竣工，历时近十年。但建成之堂规模却也可观。据称玉茗堂内有“揽秀楼、毓霭池诸景”。吉水状元刘同升（汤显祖女婿）曾为之撰联云：“门满三千徒四海，斗山玉茗；家传六七作万年，堂构金汤。”更兼玉茗堂左有省兰堂，右有寒光堂；前有芙蓉馆，后有清远楼。芙蓉馆前有四梦台。堂台楼馆，处处具妙联，日日闻吟哦，如此诸多建筑，交相辉映，组成了蔚为壮观的汤家“沙井新居”。汤显祖弃官归里后二十载，凭堂而居，专事文学戏剧创作，歌咏俯仰，倒也自得其乐。

美哉玉茗堂，只可惜一代名胜，于清顺治乙酉年（1645年）为清兵焚毁。后虽于康熙年间由抚州通判陆轺集资重建，却又不在于何年毁于火灾。及至民国时期，仅存“汤家玉茗堂”古碑一块了。然仅此一碑，于十年动乱期间，也竟被当作“四旧”破除。至今，玉茗堂之遗物，早已荡然无存。

然而，火灾烧不毁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人祸”摧不垮人民对“真、善、美”的艺术追求。1979年，国家拨款一百万元，在玉茗堂旧址上，建起了“玉茗堂影剧院”。这座金壁辉煌的建筑，熔中西建筑为一体，古朴华丽，雄伟壮观，引来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引来了闻名于世的歌星、影星，也引来了仰慕“东方莎士比亚”的国际友人、国内名流。1982年10月，文化部在抚州召开了汤显祖逝世366周年紀念会，不少专家、教授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发表了不少汤显祖研究论文，并在玉茗堂影剧院观看了汤显祖剧作演出。今若无瓜李之嫌，愿借当代戏剧家石凌鹤及当代历史学家姚公骞教授所作长联一副，以缅怀当年玉茗堂的主人——汤显祖：

百代宗师，雄才博学，正气塞苍冥。多回拒结

权臣，毋惜春闱落第，留都弹首辅。凭教谪贬到边隅，弗辞逆旅瘴蒸，兴修书院，招来俊彦论文，甚似孤鸿横晚照。宦海何曾浪稍宁，《红泉》《问棘》，独傲儒林，劝农陌上，夜话桑麻，深耕绿野。斜坞薰风唱采茶，逸爱平昌，歌麇陶靖节。格里还真，倾华夏仰尊汤若士。

半生廉吏，厚德仁怀，精诚充宇宙。几次擒捕猛虎，敢于除夕释囚，县令斥中涓。但愿挂冠归故郡，长守家山清秀，主座乐坛，指点伶工按谱，恰如群燕奋朝晖。世间只有情难诉，使剑诛邪，狱怜小玉，寻梦梅根，心惊蚂蚁，醉醒黄梁。明窗皓月欢健舞，缅怀岱岳，幻觉武陵源。知音欣曲，遍寰中争演《牡丹亭》。

汤显祖手迹

侍立湯顯祖首拜

伯父也美之與父同也伯父也美之與父同也
 人知命也——同君事錫是德羊也
 吳六中解之也七未渴 吳太守是具甲里威
 附定表核之也日藏卷自能也也也也
 復見各弟併
 吳六二賢從者 吳會元憲為一也也也也也